



新视野教师教育丛书·音乐教育系列

中国音乐教育简史

褚灏 马晔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新视野教师教育丛书·音乐教育系列

中国音乐教育简史

褚灝 马晔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音乐教育简史/褚灝，马晔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9

(新视野教师教育丛书·音乐教育系列)

ISBN 978-7-301-26929-9

I. ①中… II. ①褚… ②马… III. ①音乐教育—教育史—中国 IV. ①J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9589 号

书 名	中国音乐教育简史
ZHONGGUO YINYUE JIAOYU JIANSHI	
著作责任者	褚灝 马晔 编著
丛书策划	姚成龙
责任编辑	巩佳佳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929-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yjy@pup.cn
电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4934
印刷者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商	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426 千字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 010-62756370

序

在享有“乐感文化”美誉的中国，音乐教育历史悠久，教学实践活动丰富，形成了传续数千年的乐教传统。它就像一条不息的河流，奔腾至今，愈加宽广。从传承方式来讲，一方面，我国历代都有专门从事音乐教育的机构，如商代的“瞽宗”，西周的“大司乐”，汉代的乐府，南北朝的清商署，隋唐的太常寺、鼓乐署、教坊、梨园，宋代的太常寺等；另一方面，还有民间俗乐的自然传承与民间戏曲的师徒传承等，构成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独特历史景观。从音乐教师层面上看，夔、师旷、孔子等名师辈出，流芳百世。从音乐教育思想方面观之，既有主流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所以修外、乐所以修内”“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乐”的儒家“礼乐教化”思想，也有“大音希声”“法天贵真”的道家乐教观念，留下了《论语》《乐记》《淮南子》《声无哀乐论》等有关音乐、“乐教”的理论著作，对当今的音乐教育观念依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在与西方进行交流和互相学习的过程中，中国近代意义上的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教育、师范音乐教育、专业学校音乐教育的体系逐步建立起来，涌现出沈心工、李叔同、蔡元培、萧友梅、黄自、吕骥、贺绿汀、李凌等大批现代音乐教育家，音乐教育的美育作用得到确认，音乐教学实践日臻体系化、制度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愈加受到重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音乐教育法规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理论建设，亦或是音乐教育学学科建设，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

中国音乐教育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发展史，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也有时段上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无论是形上的哲学思想，还是形下的教学实践，都应该认真地加以梳理、总结和研究，以俾于音乐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和开拓，一些卓有视界和学术担当的学者开始着手于此，陆续取得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如陈其伟等的《中国音乐教育史略·上卷》(1993)、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1997)、伍雍谊的《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1999)、马东风的《音乐教育史研究》(2001)、马达的《20 世纪中国学校音乐教育》(2002)等。这些成果勾勒出了中国音乐教育史的大体框架，奠定了我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的基础，为逐渐壮大的音乐教

育学习者和研究者队伍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学习资料和开阔的研究视野。然而,这些成果多为断代史性质的研究,通史性、教材性的音乐教育史作品目前还没见出现。

褚灏和马晔两位同志合作编著的这本《中国音乐教育简史》正是这样一本通史性、教材性的著作。该书写作目的明确,写作体例统一,逻辑线条清晰,内容简明扼要。全书周全于中国音乐教育发展历史的宏观观照,亦不疏于所用材料的翔实考证。书中内容融汇了前人的成果,更有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每章后面的思考题目,依各章的重点和特点而列,知识性和启发性兼备,使读者学习起来更有针对性和趣味性。相信该书会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音乐教师、音乐教育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欢迎。本书编撰者长期从事音乐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谨望二位能持之以恒,继续努力,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为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育史研究专业的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王耀华

2019年4月7日

目 录

上编（古代部分）

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教育	(3)
第一节 音乐的起源与广义的音乐教育	(3)
第二节 传说中最早的学校和学校音乐教育	(6)
结语	(7)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	(8)
第一节 夏代的音乐教育	(8)
第二节 商代的音乐教育	(10)
第三节 西周的音乐教育	(12)
结语	(20)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教育	(21)
第一节 学术下移与“士”阶层的出现	(21)
第二节 官学与音乐私学教育	(23)
第三节 音乐教育思想	(28)
结语	(40)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音乐教育	(41)
第一节 音乐教育的文化背景	(41)
第二节 音乐教育	(43)
第三节 音乐教育思想	(47)
结语	(58)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教育	(60)
第一节 音乐教育的文化背景	(60)
第二节 音乐教育	(61)

第三节 嵇康的音乐教育思想	(67)
结语	(69)
第六章 隋唐五代时期的音乐教育	(71)
第一节 音乐教育的文化背景	(71)
第二节 政府和宫廷音乐机构中的音乐教育	(72)
第三节 民间的音乐教育	(81)
第四节 王通、白居易的音乐教育思想	(86)
结语	(89)
第七章 宋元明清时期的音乐教育	(91)
第一节 音乐教育的文化背景	(91)
第二节 宫廷中的音乐教育	(94)
第三节 社会音乐教育	(100)
第四节 古琴音乐教育	(109)
第五节 中西音乐交流中的音乐教育	(113)
第六节 音乐教育思想	(116)
结语	(124)
下编 (近现代部分)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音乐教育	(129)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教育方针及政策	(129)
第二节 学堂乐歌	(134)
第三节 教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概述	(140)
第四节 美育与音乐教育思想	(142)
结语	(147)
第二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音乐教育	(149)
第一节 中小学音乐教育	(149)
第二节 中等师范音乐教育	(155)
第三节 高等师范音乐教育	(157)
第四节 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164)
第五节 音乐教育思想	(168)
结语	(203)
第三章 红色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音乐教育	(205)
第一节 共产党领导下的不同时期的音乐教育情况	(205)
第二节 鲁迅艺术学院	(211)
第三节 以吕骥为代表的苏区音乐教育思想	(215)

结语	(216)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音乐教育	(218)
第一节 中小学的音乐教育	(218)
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	(228)
第三节 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	(235)
第四节 专业音乐教育	(240)
第五节 美育与音乐教育思想	(244)
结语	(248)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教育	(249)
第一节 中小学的音乐教育	(249)
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	(251)
第三节 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	(253)
第四节 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	(255)
结语	(257)
第六章 新时期的音乐教育	(258)
第一节 中小学的音乐教育	(258)
第二节 中等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	(272)
第三节 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	(278)
第四节 专业音乐教育	(289)
第五节 现当代音乐教育思想及音乐教育家	(291)
结语	(296)
主要参考文献	(297)
后记	(303)

上 编
(古代部分)

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教育

(远古—前 21 世纪)

中国的音乐教育由来已久，有意识的音乐教育行为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代。因为与远古先民物质（生产、饮食）、精神（图腾崇拜、宗教、祭祀）、生物（生命繁衍）等层面的生存需要密切相关，音乐得以产生并在各层面的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人类对音乐的艺术和社会价值等功能性认识的逐步加深，音乐教育也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在学校的萌芽期即成为其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

第一节 音乐的起源与广义的音乐教育

广义的音乐教育是随音乐的产生而产生的。通过对一系列人类早期文明史料的研究发现，音乐是产生时间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鲁迅认为，当语言系统还未在人类的大脑中完全形成时，音乐的雏形便在原始人类的“杭育杭育”声中孕育出来。^①郭沫若也持这种观点，认为“原始人之音乐即原始人之语言”^②。

从音乐发生学的角度考察，音乐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学术界有劳动说、模仿说、巫术学、求爱说等多种理论。无论哪种学说都证明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即音乐产生于原始人类的日常生活及其需要。《礼记·礼运》这样记载礼乐的起源：“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蕡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这说明“乐”与“礼”同时产生于饮食、祭祀等日常活动。《吕氏春秋·古乐篇》这样记载乐器的起源：“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臯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缶为生活用具，麋则由狩猎所得。再如《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关于歌曲创作的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候人兮猗》这首最古老的恋歌，用极简洁的语言描写了禹之妾在涂山前

^① 鲁迅在 1934 年写的《门外文谈》中，对《吕氏春秋·淫辞篇》“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讃，后亦应之。此其于举大木者善矣”的记载，解读为“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抬木头，都觉得很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

^② 郭沫若：“‘和’与‘言’二字在古代都是指乐器。和是小笙，言是大箫。言与音二字在古代是同类字。”他认为这既是语言的创作，也是音乐的创作。（《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96 页）

等待他归来的场景与焦急心情。《古今图书集成·辩乐论》所记的“昔伏羲氏因时兴利，教民畋渔，天下归之，则时有网罟之歌；神农继之，教民食谷，时则有丰收之咏”，以及《吴越春秋》所载的“断竹，续竹，飞土，逐宍”的《弹歌》等，均说明歌曲创作之源在于生产、狩猎等劳动行为。

原始音乐呈现着器乐、歌咏、舞蹈三位一体的总特征，古人把这种综合性的艺术称为“乐”。到氏族公社时期，中国的原始先民已创造出极为辉煌的音乐文化。在乐舞内容上，有图腾之乐、典礼之乐、农耕之乐、战争之乐、生息之乐等多种类型。乐舞作为史前音乐活动的典型代表，几乎反映了当时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乐器制造上，按制作材料可划分为骨、陶、石、革、竹等类；按照演奏方式划分则有吹管乐器与敲击乐器之属。在乐律学上，河南舞阳骨笛的七声音阶、河姆渡骨哨的多音列结构、新石器时期陶埙中的三度音结构及四声音阶结构表明原始先民已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形成了较稳定的音程、音阶概念，具有相当丰富的乐律学知识。

从音乐教育学的意义观察，远古先民的上述音乐成就说明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广义的音乐教育在史前人类生活中广泛存在，并且是比较重要的教育类型之一。音乐艺术随人类所需生存物质的生产而产生，内容上无所不包，行为上亦无处不在。人们活动的舞台即是施行教育的场所，凡在劳作、战争、祭祀、婚配等地点进行的音乐活动本身，都可产生音乐教育的意义，因而体现出了音乐教育对象全民化和教育场所社会化的特点。^①特别是在氏族公社后期，原始宗教信仰及祭祀仪式（礼）作为壮大部落集团势力、形成族群成员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成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祭祀礼仪活动日益频繁、复杂。在这些活动中，“乐”总是以不可或缺的角色参与其中，音乐所产生的教育意义亦随之愈加重要。音乐的性质逐渐由生活化的世俗性凸显为礼仪化的神圣性，从族群的心理、精神层面发挥着深刻的社会教育作用。

其次，为适应音乐行为的特殊性要求，专门性的音乐教育行为产生了。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经济、文化、政治、科学诸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发展，并呈现出专业化的趋向，武术、艺术、文字、天文、建筑等各门类的专业人员也必然应运而生。如《尚书·尧典》所载的“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说的就是尧帝让羲和研究时日的循环，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给大家制定出计算时间的历法的问题。音乐是专业性较强的艺术活动门类，乐舞的创编与表演、乐器的制作与演奏技法以及乐律学等各种音乐专业知识的研究、掌握、积累与传承，必然要求有专职的从乐人员担负其责，亦必然要求有一定规模的专门音乐教育行为满足这种特殊性要求。据古籍记载，五帝时期已产生许多专职

^① 喻本伐、熊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从乐人员——乐官，代表者如黄帝时期的“伶伦”、帝喾时期的“咸黑”、尧帝时期的“质”、舜帝时期的“夔”与“延”等，其主要职能就是掌管乐舞编排及音乐教育等与音乐有关的活动，可视其为专职的音乐教师。专门的音乐教育活动预示着音乐机构的设立及学校音乐教育的萌生。

最后，音乐教育观念萌芽与形成。如果说音乐技艺自身发展与传承的需要催生了专门的音乐教育行为的话，那么音乐教育观念的萌芽与形成则对这种行为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音乐教育观念随着远古先民在音乐实践中对音乐作用的认识而萌发，体现了“实”（实用）与“虚”（精神）并存、由着重于“实用”到着重于“精神”的发展轨迹。原始先民首先意识到的是音乐的实用性功能，如“女娲作笙簧”的传说、《吕氏春秋·淫辞篇》提到的“劝力歌”以及《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的“阴康氏之乐”^①等，都直接指向于音乐的实用性；即便是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场合的仪式乐舞，也是为了通过“致其敬于鬼神”而求得神灵的保佑。由于当时认识水平低下，鬼神与自然崇拜成为必然，得到神明的护佑、与自然和谐相处也成为远古先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切实需求与最高理想。远古先民认为音乐具有与诸神沟通的神秘力量，可以通过这种力量实现“人”“神”相谐。“致其敬”的实用性逐渐演变成精神性力量，音乐的“和谐”意识诞生，音乐教育的“和谐”观念也随之孕育出来。另外，氏族社会后期，阶级开始分化^②，特权阶层逐渐认识到音乐不仅可以“敬神”“娱神”“通神”，同时也可以用来“娱人”“育人”和“治人”。因此，音乐创作题材逐渐由“敬神”转为对部落首领功德的颂扬^③，音乐教育功能观也加入了道德教育的成分^④。“和谐”和“德育”两种音乐教育功能观在《尚书·舜典》关于礼、乐活动的描述中得到代表性的体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是对音乐教育德育功能的认识，而“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则是对音乐教育和谐观的描述，一方面借“乐”以培养贵族子弟必须具有的品德，另一方面维护集权化社会内部的人伦关系，沟通人与诸神的关系。正是因为形成了上述音乐教育观念，舜首任专门的公职人员夔（职名典乐）负责乐教之事，赋予乐教尊显的社会地位。

^① 《吕氏春秋·古乐篇》：“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滯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

^② “氏族首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4页。

^③ 《吕氏春秋·古乐篇》：“舜立，……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

^④ 德，是古人最为推崇的操行，因而德育历来是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从学校初萌的五帝时期始，德育即被作为教育的核心，《左传》《尚书》《史记》等书都有尧命舜推行“德教”的传说。挚传位给尧，尧年迈时传位给舜，舜又传位于遂。据《左传》载：“自幕至于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真德于遂，遂世守之。”传说中的五帝无不是美德的化身，其德行也是使人心所向的主要原因。如《尚书·尧典》中称尧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滥觞于原始社会的“和谐”与“德育”的音乐教育功能观，作为传统乐教思想的核心贯穿了整个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历程，并在历代政治、伦理、哲学思想、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审美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二节 传说中最早的学校和学校音乐教育

如前所述，氏族公社时期的音乐教育较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它已从原始自然教育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从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演变为以精神生活为其主要内容的社会活动。音乐教育有了较为明确的任务、内容和社会含义。这种进步，促生了学校音乐教育的萌芽。

据传，我国最早的学校雏形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有“明堂”“成均”和“庠”等多种类型，分别具有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育功能。^①其中的“成均”是以教授音乐为主的学校，也是我国最早的学校，出现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②《周礼·春官》中记载：“成均，五帝之学。”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大师董仲舒也在《春秋繁露》中说：“成均，均为五帝之学。”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则由“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推断出“成均”是以乐教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此推论虽然无实可考，但从许多方面可以观察出此说是可信的。前面说过，在新石器时代已有进行专门音乐教育的实际需要，并基本具备了进行这种教育的社会和物质条件。首先，迷信、巫术、图腾、祭祀等活动渐渐流行，使脱身在纯劳动之外的专门从事音乐活动的专职化人员渐渐出现，他们在进行音乐活动的同时在固定的地方兼任音乐教师是可能的。其次，正如郑玄所说的那样，“均”在古代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音乐术语和音乐名词，虽然对其含义的界定不尽相同。如《隋书·音乐志》中载：“一均之中，间有七声”，是说“均”是由七个音构成的音列；童斐在《中乐寻源》中也这样认为，“十二律各轮转为宫声一次，名曰旋宫，某律为宫称某宫，亦称某均”。《礼记·月令》认为“均”为调整音律的动词，“均琴、瑟、管、箫”。《国语·周语下》则认为“均”是调律的乐器，“均者，均钟，木长七尺，有弦系之，以均钟者，度钟大小清浊也”。但无论如何解释，“均”与音乐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认为“成均”是以教授音乐为主的学校是讲得通的。最后，《周礼·春官》在记述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时指出：“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这则记载一方面说明了“成均”之学的教学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亦可作为上述推论的证明。

现存文字资料及出土文物已经充分证明了许多神话、传说的历史真实性，因此

^① 明堂：后人又称“大教之宫”，相传由神农氏所设，学界认为是当时氏族议事之所，兼具社会教育职能。但其不具备专门化的特点，不能视为学校。庠：时之粮仓（《礼记·明堂位》）及敬老养老之所（《孟子·滕文公上》），老人进行孝道和敬老等伦理道德教育的地方。

^② 黄仁贤：《中国教育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我们不能把有关的神话和传说等闲视之”^①。虽然我们对传说中的“成均”之学不能有更具体的了解，但最早的学校是以传授音乐为主的这一结论是值得相信的。这一论证结果表明，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乐感文化”的美誉，是因为其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

结语

我国有着悠久的音乐教育历史，广义的音乐教育在史前人类生活中已广泛存在，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原始社会后期，已出现了早期的专业音乐教师，以及以教授音乐为主要内容的学校——“成均”，并形成了音乐教育的“德育”“和谐”功能的观念。原始社会时期的音乐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音乐教育是原始社会比较重要的教育类型之一？
2. 为什么说“成均”是传说中以乐教为主的学校？

^① 黄翔鹏：《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载《音乐论丛》第一卷，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第184页。

第二章 夏、商、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

(前 21 世纪—前 770 年)

公元前 21 世纪，禹之子启以武力推翻禅让制，在夏地建都，定国名为夏，从此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拉开序幕，中华民族亦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其后经历商和西周，奴隶制社会达到顶峰。夏、商、周三代时期，学校教育逐渐走向制度化并成为教育的主要形式，其共同实施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也逐渐趋于完善。无论是夏朝的“尚武”、商朝的“尊神”，还是西周的“尊礼尚施”，以礼乐教育为基本特征的音乐教育都在历代学校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完善而得到高度重视与发展。

第一节 夏代的音乐教育

夏代（约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是注重军事、崇尚武力的朝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作为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为取得、巩固与拓展政治权力，面临无休止的战乱之争，形成了“为政尚武”^② 的政治局面与政治思想，以及“以射造士”^③ 的教育观念。重视军事教育，是夏代教育的最显著特点，古籍中对当时学校的设置及其教育内容都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但为了满足礼仪、军事、享乐等需要，音乐教育仍然受到重视。

夏代的学校从氏族公社后期的学校雏形发展而来。《孟子·滕文公上》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综合多种典籍的记载，夏代的学校主要有序、校、学三种，均以射、御等军事教育为主。《礼记·明堂位》云：“序者，射也。”认为“序”是教射的场所。《礼记·王制》则认为“序”有东西之别，是夏人养老的地方：“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而《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则以为东、西序是级别不同的学校：“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关于“校”，《孟子·滕文公上》载：“夏曰校”，“校者，教也”。“校”原是养驯马匹之地，后发展为学校。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就“明人伦”的学校教育的作用指出：“校，以教民为义”，“伦，序也。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① 《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 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9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卷四十。

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夏代的学校主要由射箭、驯马等场所演变而来，教育内容上主要与习武、战事相关；然除此之外，学校兼有议政、祭礼、养老、道德教育等多重职能。

至于乐教，虽然古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据推测，夏代可能有相关的音乐教育存在。夏代音乐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种功能：

其一，备宗教礼仪之用。据文献、文物考证可知，遵循原始社会注重宗教礼仪的遗绪，夏代的礼乐活动开始走向制度化，并在商、周两代得到继承和发展。《礼记·郊特牲》载：“诸侯之有冠礼，夏之末造也。”《论语·为政》中有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些文献说明夏朝的礼制已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夏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鼓、磬等礼器也印证了这一点。乐与礼随，据《吕氏春秋·古乐》载，夏代有《大夏》等大型乐舞使用于宫廷仪式活动中，该类大型乐舞的编演与教习，由专职的乐官负责。^①

其二，配合军事训练，鼓舞士气。《山海经·海外西经》记：“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描述的就是夏后启在大乐原野上教授人们操练“九代”舞的情景。教育史学家毛礼锐、沈灌群先生据此认为，此“舞”即“武”，舞“九代”虽重在武艺的传授，但也说明军事乐舞的教习在当时是存在的。当然也有人认为“九代”既是军事训练，也是礼仪习练。^②

其三，用于享乐。夏代音乐的功用发生了改变，一些祭祀礼仪音乐演变为享乐之用。^③如《楚辞·离骚》中所说：“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特别自夏代后期始，在奴隶制特权阶层中形成了“侈乐”之风。《管子》云：“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吕氏春秋·侈乐》中亦载：“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其规模之宏大，令人惊叹。

其四，用于道德教化。《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了夏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的故事，可以推测夏人继续自觉利用艺术的特殊作用来教育和感化人们，所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④。值得注意的是，音乐之用于道德教化抑或用于声色享乐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当时已引起人们的思考。如《吕氏春秋·先己》所记，夏后启教民重视“亲亲”“长长”“尊贤”等人伦之善德，而要求“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子女不饬”，透露出夏人已开始有对音乐与品德教育关系不同认识的信息。

^① 《大夏》亦称《夏籥》，用夏代一种代表性的偏管乐器“籥”（像箫的一种乐器）表演。《吕氏春秋·古乐》：“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皋陶，时之乐官。

^② 孙培青、李国均：《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③ 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④ 《左传》文公七年，引《夏书》。